

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

苏小东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以极其弱小的实力与数十倍于己的日本海军进行了顽强的拼搏,取得了许多显著的战果,但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因此,当时指导海军抗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得失,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

日本,这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岛国,自从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以后,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最初几乎都是海军制胜的战争。因此,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海军,倚重海军实施“大陆政策”。

为适应对外侵略的需要,日本开始向大海军发展。日本政府在1907年的帝国国防方针中确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建设以舰龄不满8年的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8艘为主力,辅以巡洋舰和驱逐舰若干艘的海军第一线舰队。^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再增加一队8艘战列舰,组成“八八八”舰队。1921年,由美国倡议召开了华盛顿国际裁军会议,并签订了海军裁军条约,规定美、英、日三国海军吨位比例为5 5 3,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英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却不满意其海军兵力的发展完全被限制在裁军条约的规定之内,时刻准备挣脱裁军条

^①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76—77页。

约的限制,海军建设开始突破“八八舰队”的模式。1936年1月,日本宣布退出裁军条约,从而无限制地扩充海军。同年5月,日本政府在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时,决定编成由航空母舰10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6个、潜艇战队7个组成的远洋作战部队,逐步完成了发动大规模海外侵略战争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腹地。与此同时,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的海军兵力,直接参予各种侵略活动。

面对日本的跨海入侵,中国已有甲午战败的教训,本应早做准备,建设一支足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海军。但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至抗日战争爆发的43年间,中国海军不但没有强大起来,反而日渐衰弱。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继承了清王朝的海军遗产,共有军舰34艘3万余吨。其中,千吨以上的军舰仅有9艘,且舰龄均已超过15年,服役最长的甚至达36年之久。有鉴于此,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海军当局即欲奋发图强,改变海防力量薄弱的现状。1913年3月,北京政府海军部制订出《第一次置舰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国东、南、北三面滨海,海岸线绵长,系陆海交错之国,应当陆军与海军并重。如果“独注重陆军,而于海军忽焉不备,备焉而又力不厚,势将无以自存”。因此,中国海军发展规模“最下亦须求与最近最强之邻国(指日本)相埒,方能并列于强国之间”。而中国的海军战略,“应取攻守兼营主义”,但鉴于“目前财力、人力之两难”,故“似暂宜专主守势”,着重“巡弋防御与守卫防御二端”。^①海军部从战略守势出发,制订了海军10年发展计划,以使海军舰艇增加到323艘40余万吨。一个月后,参谋本部又呈报了一个《民国三年至十年第一次造舰计划案并理由书》,指出:“我国现有舰船腐朽不堪,攻既不能,守亦不可,长此废弃,殊非所以慎重国防之道。”该计

^① 《海军部呈第一次置舰计划》(1913年3月21日),《海军门·总务类》,北京图书馆藏。

划案明确以日本为假想敌，并根据日本的海军实力，提出中国海军的‘理想扩张案’，即在1920年以前购造战斗巡洋舰、侦察舰、鱼雷驱逐舰、潜艇共162艘100余万吨。但计划的制订者明知这个‘理想扩张案’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根本无力实现，遂又面对现实，将原方案压缩为购造舰艇96艘30万吨。^①然而，随着国内政局的不稳和内战的兴起，不论是海军部的计划还是参谋本部的方案，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在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间，海军除接收清末向外国订购的9艘军舰外，仅新增舰船17艘，其中大多为200吨左右的浅水炮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海军的发展仍然未能出现新的转机。1929年，海军部提出一个15年内造舰60万吨的计划，但因经费无法落实而成为泡影。此后，海军当局几乎每年都向政府呈报扩建海军的计划，结果均未能实现。海军当局只能自筹资金，逐年添造一些中小型舰艇和改造部分旧舰艇。

1931年11月，即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组在向大会提交的《中华民国国军整理建设计划案》中仍然认为：“中国目前若欲建设强大之海军，则为国家财力所弗许”，只能“采取小舰自造自修主义”。^②1932年春，日本发动淞沪战争，先后出动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50多艘军舰、数十架飞机、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入侵淞沪地区及长江流域，最后迫使中国接受了不平等的停战协定。这一事件强烈地刺激了中国海军当局。同年4月，海军部拟订出明确以日本海军为假设敌的《海军建设计划草案》，认为：“吾国海军欲求其与日本在海上作战，至少须有其海军之七成……对于日本作战首所争者，中国海（辽海、黄海、东海及南海）海上之制海权。今既不能建设与之相等之海军，又不能建

^① 《民国三年至十年第一次造舰计划案并理由书》（1913年4月5日），《海军门·总务类》，北京图书馆藏。

^②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议事纪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设其七成，则中国海海上之制海权将为日本所独占，而我全国沿海胥成罿隙矣。在此情形之下，唯有先建设日本海军之四成兵力，以保持中国海近海之自由以濡滞日本海军及其陆军之行动。”^①但是，这一计划草案没有被政府所接受，海军部遂又于次年再次呈报一个《海军国防计划草案》，进一步重申了前一个计划草案的内容。

1934年，国民政府制订出《国防计划》，在其中的海军部分指出：“日本为海军极强之国之一，吾国纵建设相当之海军，亦非其敌，明矣。然而，果能建设相当之海军，再极力整理现在海军，则在彼与英美海军周旋于太平洋之期间，吾力必能歼尽彼之第二线之预备军，如彼之现驻于吾沿海沿江之预备役舰艇等者，其结果则海上及沿海之大道必尽归我管制，而沿海及内地始胥安且也。”^②这个计划尽管出自政府，而且已将海军建设目标订得很低，但还是没有下决心付诸实施。

直到1937年初，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和海军部又共同拟定了一个《国防军事建设计划草案·海军》。内称：“吾国海军欲求其能与日本在海上作战，至少须有其海军力之七成。考日本之海军力共计七十六万三千吨有奇，故吾国应有海军五十四万吨左右，始足以资对抗。”鉴于中日海军兵力差距太大，而“吾国之海军建设需时甚久，要塞又需费孔巨”，暂时无法达到要求，故只能放弃与日本海军争夺中国近海制海权的战略方针。“处今日情况，欲使敌舰不致深入腹地，随意登陆，除以陆军防御，空军轰炸外，殊有赖于水中防御。水中防御物计有水雷、强缆、浮筏、链锁、防网、沉船等，而以有线水雷及机雷为主……”^③由此可见，海军建设的重点至此已明确转移到水上防御方面，目的在于阻止日本海军登陆和进入内河。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787全宗，第2080卷。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787全宗，第1463卷。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787全宗，第2058卷。

日本全面进攻中国采取的是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1936年8月,日本政府确定了《国策基准》,根据‘基准’的精神,军方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1937年)《作战计划》,规定海军的任务是“击灭中国舰队,压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流域,与陆军协力占领要地”。^①同年11月,日本政府又制订了《陆海军军事协定》,对全面侵华以后如何协调陆海军联合行动,以及作战地区、主攻方向等都作了详尽的协定。1937年7月7日,日军策划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此前后,又将大批海军兵力调到中国,随时准备封锁中国海域,攻击中国海岛及沿海沿江阵地,进行登陆作战。

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中国海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投入反侵略战争,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当时,制定海军战略的依据主要有二:

其一,海军的作战方针必须服从政府总的抗日战略。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略必然是自卫性和防御性的。为了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国民政府将战略防御方针具体化为‘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针,即‘在野战战略方面采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②8月20日,蒋介石颁布的大本营训令第一号《战争指导方案》中指出:‘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同一天颁发的大本营训令第二号《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又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3页。

^② 陈小功:《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① 它同时要求全国政治、经济、宣传、教育、民众工作等，均以坚持持久战为最高原则。海军的作战方略也不例外，同样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总的抗日战略，以防御性的持久消耗战略为总的原则和方向。

其二，海军的作战方针必须符合现有的海军实力。这是因为，海上作战力量的强弱，对战争形式和方法的选择以及对海上作战行动规模的大小、持续时间的长短、战争的结局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所谓海军实力的强弱，主要是相对于敌国而言。据日本防卫厅统计：“1937年6月调查，日本海军共拥有285艘舰艇，其中包括9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12艘重巡洋舰、13艘轻巡洋舰、70艘驱逐舰、44艘潜艇。另外，还有1艘练习战列舰、2艘水上飞机母舰、5艘潜水母舰，总吨位115.3万吨。同时正在建造中的军舰有37艘，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和2艘航空母舰。”^② 此外，日本海军航空兵还配有舰载飞机182架、陆基飞机629架。相比之下，中国海军虽有第一、第二、第三、练习、测量、巡防、广东江防等七支舰队共118艘舰艇，总排水量却只有6.8万余吨，尚不及日本1艘大型战列舰的吨位，约相当于日本海军总吨位的5%。不仅如此，中国军舰普遍吨位小，质量差，主要军舰多为清末遗物，其中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4300吨）已有40年舰龄。实际上，中国海军能出海与敌作战者，仅“平海”（2600吨）、“宁海”（2600吨）、“应瑞”（3000吨）、“逸仙”（1500吨）4艘巡洋舰。至于飞机，中国海军仅有10架，还是训练用的教练机。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海军实力较日本海军相差极为悬殊，根本不具备攻势作战的条件。即使是防御作战，也需退入海口、内河，借助于地形之利，并采取灵活多样的作战形式，才能坚持长期抗战。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230页。

早在 1936 年底, 国民政府参谋总长程潜即已开始着手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该计划于 1937 年 3 月正式修订完成, 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在该计划中, 首先对日军的实力作了分析估计, 对于日军可能进攻的地区、主攻方向和作战规模作了预测, 并针对日方将采取的战略方针研究了作战对策。作战对策分为‘甲’、‘乙’两个方案。在《甲案》中, 决定集中兵力在华北与敌决战, “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 挫折敌之企图, 以达成国军之目的; 于不得已时, 实行持久战, 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 乘机转移攻势”。在“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 于开战之初, 应首先用全力占领上海, 无论如何, 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 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 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 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灭之。不得已时, 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 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 以拱卫首都。对杭州湾、江阴之江面实行封锁, 阻绝敌舰之侵入”。海军的任务是‘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 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要领为: ‘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 保持我之实力, 全力集中长江, 协力陆空军之作战。’作战方案是: ‘一、第一、第二舰队于宣战时, 借机敏之行动, 迅速集中长江。在宣战同时, 与我空军及要塞协力, 扫荡江内敌舰, 尔后与要塞担任长江下游之警备, 协力陆军之作战; 二、第三舰队平时应警备山东半岛沿海岸, 务于开战之先, 迅速集中长江, 担任下游之警备, 并协力陆空军之作战; 三、各舰队于平时严整战备, 以防敌海军不意之袭击。’^① 《乙案》与《甲案》内容基本相同, 但规定的海军任务稍有变化, 即: ‘海军于开战初期, 以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 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扫荡扑灭敌在我长江之舰队, 尔后则封锁长江各要口, 并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 阻止敌之登陆。^②

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民政府在初期的作战部署基本上是按《乙

^① 《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 《民国档案》, 1987 年第 4 期, 第 42—43 页。

^② 《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 《民国档案》, 1988 年第 1 期, 第 36 页。

案》执行的。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国防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规定海军的具体任务是：“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要塞及地面部队作战。”在同一天发布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训令稿》，又指示海军：“敌舰进入长江下游，企图强行登陆，或转用兵力时，应尽全力攻击之，以协同陆军作战，纵有牺牲，亦在所不辞。”^① 在上述计划中，国民政府所规定的一系列方针、要领、任务、目标，成为指导中国海军进行抗日作战的基本战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海军的抗日作战方略是先取攻势防御，不得已时则转入守势防御。攻势防御以长江下游为作战前沿，一方面协同陆军攻击由海口进入长江登陆之敌，一方面封锁围歼已在长江中游的敌海军舰队。但是，由于日军首先发动了上海战役，使作战前沿后置于江阴的中国海军未能实现抗登陆作战计划。在此之前，中国海军封锁长江的计划被泄露，日本海军在长江内的数十艘大小舰船及时逃脱，围歼计划也告落空。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实际上实施的是守势防御。

三

中国海军参加抗日作战是从淞沪战役开始的。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淞沪战役后，中国海军主力即在江阴建立阻塞线，阻止日本海军沿江西上，协同陆军坚守淞沪，拱卫首都南京以及掩护国民政府西迁，这是海军作战的第一阶段；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中国海军又奉命退至长江中游，继续建立阻塞线以阻遏日舰西犯，保卫武汉，这是海军作战的第二阶段；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中国海军采取水雷封锁和敌后布雷等游击战的方式进行持久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10、13页。

战，在长江流域配合陆军拱卫陪都，这是海军作战的第三阶段。^①在不同的阶段，海军的作战形式、战术指导原则和作战任务也不尽相同，但又具有连续性和交叉并行的特点。纵观海军抗战全过程，其作战形式主要有：

(一) 沉船阻塞战。这是中国海军在第一、二阶段作战中的主要战法，作战地域在长江中下游及重要海口，战术指导原则是以沉船阻塞航道，辅以舰队、炮队、水雷进行阵地防御。

1937年8月上旬，日本海军舰艇在吴淞口外马鞍群岛一带海面集结，有侵入长江攻打上海、南京的企图。为防止日舰溯江西犯，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由海军在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地江阴实施封锁，以保障南京的安全。8月11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沉船阻塞江阴水道的命令。当天，海军派出3艘测量舰及2艘炮艇，将江阴下游各处的灯塔、灯标、灯船等航行标志全部破除。同时，海军将8艘旧舰艇以及征用的23艘商船和没收日商的8艘趸船依次沉于江阴水道，构成一条阻塞线。不久，又将“海圻”等4艘40年以上舰龄的巡洋舰沉于阻塞线之后，另行构成一条辅助阻塞线。总计江阴水道，共沉大小舰船43艘，约6.4万余吨；另沉民船、盐船185艘及大量石料，用以填补空隙。同时，由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平海”等4艘主力舰警戒、保卫江阴水道，“以期在国防上造成坚强之封锁线”。^②

淞沪战役爆发后，海军在上海也采取了沉船阻塞港汊航道的措施。从8月14日开始，海军先后将1艘运输舰沉塞于董家渡航道，将扣押的6艘日本货船沉塞于江南造船厂附近航道，将征用的16艘商船沉塞于十六铺航道，从而在黄浦江内构成三道阻塞线。此外，还在淞沪一带港口布设了三道水雷封锁线。这些阻塞线、封

^① 陈绍宽：《抗战六年来的海军》，《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21页。

^② 陈绍宽：《海军抗战纪事》，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编印：《海军抗战事迹汇编》，第3页。

锁线的设置,粉碎了日军溯江西上,从后路包抄中国地面部队的企图,有力地支援了陆军在淞沪的抗战。淞沪会战得以坚持和会战后期“陆空军亦得以从容退出淞沪,均与海军阻塞董家渡水道之策划大有关系”。^①

日军在侵犯淞沪期间,对江阴阻塞线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日本海军因无法以舰艇打通江阴航道,遂改用岸基和舰载舰空兵出战,企图首先消灭中国海军主力。自8月22日开始,日本海军连续出动飞机,对江阴阻塞线后的中国军舰进行轮番轰炸。中国海军在完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以舰炮和机枪奋力抵抗,第一舰队遭受严重损失后,第二舰队便立即赶来参战,先后共击落日机9架,击伤多架。但中国海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有11艘舰艇被炸毁击沉,主力舰丧失殆尽。为继续作战,中国海军又在江阴水道两岸建立要塞炮队以保护阻塞线,直至12月1日奉命撤退。日军虽然很快从陆路攻占了江阴,但打通江阴水道的工作直到1938年3月才告结束。中国海军在江阴的阻塞战对于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粉碎其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海军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又在江西境内长江中游的马当江面建立了一道沉船阻塞线。这道阻塞线共沉船30余艘,布设水雷800余颗,由海军炮队在两岸守卫。日本海军因舰艇进攻难以得逞,便派陆战队登陆包抄中国海军炮台。中国海军由于得不到陆军的有力支援,坚守半载的马当终于失陷。

在抗日战争初期,驻守青岛的中国海军第三舰队曾奉命将全部舰艇沉塞于青岛大、小港及威海刘公岛水道中,以限制日本海军在此两水道的自由行动。不过,第三舰队的沉船阻塞并无作战相配合,因此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二)水上袭击战。这是中国海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采取的小规模突袭行动,作战地点在上海,战术指导原则是利用黑夜和熟悉

① 陈绍宽:《海军抗战纪事》,《海军抗战事迹汇编》,第2页。

地形的有利条件,由小股兵力以水、鱼雷为武器进行主动出击。

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即8月14日,电雷学校快艇大队副大队长安其邦奉命率领2艘经过伪装的鱼雷快艇,由江阴潜驶上海,于16日晚向日舰队旗舰“出云”号航空母舰实施突袭。1艘快艇冲至南京路外滩,在距“出云”号300米左右处连续发射2枚鱼雷,但因“出云”号周围布设了防护设备,鱼雷未能直接命中目标,仅雷体爆炸后的冲击波使其受到轻微创伤。中国快艇在转舵回驶时被日舰发现,遭其猛烈射击,结果中弹沉没。战后,日本方面说“这是中国海军的唯一的一次积极攻击手段”。^①其实并非如此,中国海军在鱼雷快艇袭击日舰受挫后,又改用水雷进行袭击。9月7日晚,海军布雷兵用水雷将日军堆放大量煤炭的三井码头和储存汽油的趸船炸毁,将其2艘汽艇炸沉。9月28日,布雷兵潜至春江码头,以水雷袭击“出云”舰,因爆炸点距目标较远,只炸伤其舰尾及周围4艘铁驳船和1艘小火轮。此后,布雷兵又两次袭击“出云”号,也都没有成功。10月3日,海军布雷兵袭击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旗舰“安宅”号,但未等靠近即被发现,袭击失败。11月12日,电雷学校总教练官马步祥率1艘鱼雷快艇从江阴下驶,于次日晨进抵吴淞口向日舰发射鱼雷,因未能命中目标,结果遭到日舰的还击而艇毁人亡。在淞沪会战期间,中国海军多次派出小股兵力袭击日舰,均未取得预期战果,其教训主要在技术方面,并非战术原因。就当时中国海军的实力和战场在中国内河的特点而言,这种作战形式无疑是可取的,只要不断在技术上积累经验,就一定会奏效。后来中国海军又将其发展为布雷游击战。

(三)水雷封锁战。这是中国海军在第二、三阶段作战中的主要战法,作战地域在长江中游,战术指导原则是以水雷封锁航道,辅以要塞炮队进行阵地防御。

早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中国海军就曾在阻塞日舰的航道上布

^① 濑名尧彦:《扬子江上的战斗》,(日)《世界的舰船》,1982年第2期,第137页。

设水雷,但只是一种辅助措施。进入第二阶段作战以后,尤其是马当阻塞线瓦解后,已无军舰和商船可以沉塞航道,遂改以水雷为主进行封锁。国民政府撤至武汉后,中国海军在长江中游建立了三道防线,以阻止日舰西犯武汉。第一道防线即为马当的沉船阻塞线,因陆军配合不力,于1938年6月30日被日军攻破。第二道防线设在江西的湖口、九江,开始采用水雷封锁航道,共布放水雷1600余颗,并有海军炮队和陆战队在两岸防守。第三道防线设在田家镇,为武汉之前卫,先后共布雷1000余颗,由部分舰艇担任布雷或掩护雷区的任务,并在雷区附近江岸建立炮台要塞。按照1938年4月制订的长江防务计划,海军负责守备各道防线的要塞和担负长江正面防务,陆军负责防守要塞外廓阵地。7月,侵占马当的日军向第二、三道防线发起进攻。中国海军在力量极为薄弱的情况下,冒着日机的轰炸和日舰的炮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海军要塞部队伤亡越来越严重,加之陆军在外围与登陆日军作战失利,使陷入包围的海军官兵无力长久坚守要塞。在不到1个月内,第二道防线的湖口、九江即先后失守。9月底,第三道防线田家镇也告陷落。

在中国海军抗日作战的第三阶段,水雷封锁仍是主要的作战形式。1938年底至1943年底,中国海军的四个布雷总队先后在洞庭湖、沅江、湘江、荆河、川江等处水域共布水雷1.4万余颗,使日军在湖南境内的水上行动到处受阻,并将其彻底封锁在川江之外。中国海军的水雷封锁战尽管没能给日本海军以重创,但进一步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国民政府从武汉迁至重庆和陆军部队的转移争取了时间,因此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四)布雷游击战。这是中国海军在第三阶段作战中,也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采取的攻势作战,作战地域在长江中下游,战术指导原则是以各种水雷为武器进行敌后水上游击战,袭击日军舰艇及其运输船,破坏与切断日军水上交通线。

随着武汉的失守,日军舰艇在长江中游的活动剧增。为了破坏

日军占领区的水上运输线,国民政府指示海军:“在长江各段实施水上游击,发挥敌后攻势,以遮断敌水上交通为目的,袭击其舰艇及运输船只为手段,作无定时无定地之钻隙踏虚布雷。”^① 1939年1月,中国海军开始组建长江中游敌后布雷游击队,后来随着布雷游击队范围的扩大,又增编了湘鄂布雷游击队和4个挺进布雷队。至于游击活动范围,先划定芜湖至湖口段沿江各地带为长江中游第一布雷游击队。1940年4月,又将第一布雷游击队由湖口扩展至长江下游的江阴,再将鄂城至九江段划为第二布雷游击队,监利至城陵矶段划为第三布雷游击队。

布雷游击队于1940年1月20日正式成立。布雷游击队利用熟悉地形,有当地群众掩护的有利条件,采用先侦察目标,再靠近布雷,布雷后即撤的战术,使袭击频频奏效,自己却很少伤亡。他们不分昼夜、阴晴、寒暑,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四面出击,打得日军防不胜防。日本海军为此专门采取措施,规定商船、运输船出航须由军舰护送,禁止集结行驶,不得夜间航行,经过布雷游击队区须加速行驶,等等。^② 尽管如此,日军舰船仍不断遭到袭击,最后只得完全停止了在中国海军布雷游击队的水上活动。到1945年8月,布雷游击队在三个布雷游击队共布雷1500余颗,炸沉日军大小舰船135艘,其中包括10余艘大、中型军舰,伤亡其官兵5000余名,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可谓战果辉煌。

以上是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四种主要作战形式。就其战术而言,有攻有守,可以说都是“持久消耗战”这一抗日总战略在海军战术中的具体体现。

① 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海军战史(1937.10—1941.10)》,第35页。

② 陈绍宽:《近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发展之方针》,《海军抗战事迹汇编》,第30页。

四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广大官兵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顽强抵抗,奋战到底,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勇敢精神,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而肯定了这一点,又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战略战术之得失进行深入剖析和评价。

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是防御性战略,这是由战争的性质和国家总的抗日战略决定的,无可厚非。防御战略可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海军战场主要在海上,海军外线作战具有广阔的舞台,积极防御的纵深地带有很大的弹性。在战争状态下,能否利用这种弹性,将海军的作战前沿尽量前伸,创造机会消灭敌方主力,从而夺取制海权,是衡量海军战略和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尺。这里的关键,是海军的作战实力。而海军的实力建设是在平时实施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海军在抗日战争中采取什么战略早在战前就已经定型了。国民政府战时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在1943年总结海军抗战工作时说:‘要防守一个海口,或是某一个登陆点,一定要采取积极的防守办法。必须用海军力量,在海口以外与敌舰决战,或将敌舰歼灭,或将敌舰击退,使敌人攻击力消失,自然将这个海口保全。’但是,‘因为政府过去对海军的忽视,足以防卫各海口的海军最低限度建设,迄未照海军计划办理’,以致现有海军实力根本不堪出海一战。^①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国海军就不得不将整个中国沿海的制海权让予日本海军,退而实施内河防御。其结果,日军不仅得以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海上封锁,而且完全掌握了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的主动权,使中国海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中国海军退入长江实施防御,也同样存在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战略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作战形式和战术运用的选择。在抗日

^① 陈绍宽:《抗战六年来的海军》,《陈绍宽文集》,第316页。

战争中,中日海军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这是不利的方面。敌强,一是指日军舰队实力强大,因此不宜与其进行舰队决战;二是指日军航空力量强大,因此不宜与其进行水上阵地战。但中国海军也有有利的一面,即在中国内河作战,敌方的大军舰、大舰队没有用武之地,我方却占有熟悉地形的优势,并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可以开展广泛的水上游击战。战争初期,中国海军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封锁长江,迟滞日军的进攻,支援陆军作战,保障国民政府驻地及其转移的安全。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国海军从江阴开始,沿长江步步设防,与敌进行了多次阵地战,这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当时日军空中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海军在不宜进行阵地战的情况下而为之。当时海军应把有生力量和作战潜力最大程度地保存下来,为尔后作战奠定物质基础。即如江阴阻塞战,在沉船阻塞航道以后,本应以设置和加强两岸炮阵地为重点,这样不但能以交叉炮火阻止日舰打通航道,而且抗击日机空袭也有较强的隐蔽性。但中国海军却以全部主力军舰来保护阻塞线,结果成了日机轰炸的靶子,直至丧失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作战的攻防结合方面,中国海军在抗战初期没有很好地利用地利优势,在战略上实行内线持久防御作战的同时,在战役战斗中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作战。淞沪会战期间,中国海军虽然多次派出小股兵力袭击日舰,但因技术准备不充分,先后都失败了。总的说来,袭击战开展不够广泛,直到进入第三阶段作战时,才开始实施布雷游击战。这说明,中国海军对积极防御战略的认识还很不够,战术运用水平还比较低。

中国是一个濒海大国,因此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兵种齐全的海军,并以积极防御战略作指导,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卫国家的海上安全。抗日战争虽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中国海军抗战给我们留下的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仍是前车之鉴。

(作者单位: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政教室)